

□ 王虎学

鲜明的“学术形象”

2010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来到中央党校工作，恰好被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后改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邱耕田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其实我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就读过邱老师写的一些文章，知道他是我国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知名学者。

初来中央党校的一天晚上，我去办公室看书，发现邱老师也在办公室，于是就过去和他聊天，并就一些科研问题向他请教。邱老师鼓励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一定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即教学和科研“两手”都要硬，做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校老师。说到科研，他强调最多的是要选择一个与自己的兴趣、专业及党校特点相符的研究方向，这样一个研究方向至少有两个要求：一是在学科结构上具有“中观”性，即要介于宏观的基本原理和微观的现实问题之间，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能起到一个相互贯通的“桥梁”作用；二是要能长期坚持，发扬滴水穿石股的精神，直至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权威，并成功打造自己鲜明的“学术形象”或“学术符号”。

邱耕田老师还就“学术形象”进行了解释。在他看来，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学术符号”现象，当我们一提到某位学者时能立刻想到他是研究什么的，或者一进入到某一研究领域就能立即想到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是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学术形象”或“学术符号”现象。“学术符号”是一个学人成为某一领域研究专家的身份性或标志性的东西。邱老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发展哲学的工作，其研究方向稳定集中、学术形象鲜明突出。由于长期耕耘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邱老师目前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发展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在20多年的学术实践中，他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或影响较大的观

以哲学思维观发展

——记中央党校邱耕田教授



邱耕田，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和“四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出版了《发展哲学导论》《低代价发展论》《哲学视阈中的科学发展》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先后承担了1项教育部资助的课题和3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其中有1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项成果被评定为优秀。

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和邱老师的接触中发现，他在研究上的主要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关注和思考社会发展问题，而这一点，对于我的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

在邱老师看来，对于日新月异的 社会发展活动，人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就特别要求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这种研究工作。这样一种将学理性和现实性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不仅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而且还会使我们对纷繁复杂的发展现象获得深刻而准确的体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富有意义的分析框架。

在邱老师的研究中，他总是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观点和方法搭建一个分析框架或平台以阐释说明现实的发展问题，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例如，199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繆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该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文明冲突论”。在这本著作中，亨廷顿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

大量新的冲突”。邱老师运用“发展模式”这一发展哲学的重要范畴和“问题→模式”分析法指出，在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主要是不同发展模式的博弈，文明或文化只是外在的、标签性的东西，只有现实的发展及其发展模式才是内在的、根据性的东西，文明只是从文化的层面反映并影响了这种冲突。

再比如，在2016年的《天津社会科学》上，邱老师发表了《刺激应变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发展》一文。在该文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原理提出了刺激应变原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分析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今天的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创新而不断走向强大和富裕，但不断崛起的中国却面临着比较大的外部阻力。对此，一些人感到相当困惑和不安。邱老师认为，其实在刺激应变原理看来，我国的发展强大在国际上至少能引发两种不同的“应变”：一是学习借鉴型或见贤思齐型的应变，二是“阴损型”或“阻挠型”的应变。对此，我们要抱有平和包容的心理，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客观甚至必然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打铁还需自身硬”，关键是我们自己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为我们应对任何挑战和考验打下坚实基础。



深度观察

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

□ 郗 戈

新发展理念具有显著的 科学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应用与发展。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把握住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规律；既揭示了中国社会自身的纵向发展规律，又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横向交往规律。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关切并不是要不要发展、要不要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发展、要何种现代性的问题。发展问题的关键是，超越旧的发展方式，建构新的发展方式，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需要新的发展理念的 科学指导。

当代社会发展包含着内在矛盾，一方面，中国社会蓬勃 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又面临诸种风险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与深入推进，摆脱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社会生活及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从总体上步入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以至发展方式的不健全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生态环境破坏等等。这些表象上的问题，说到底源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一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领域出现了动力不足的“瓶颈”。二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存在。三是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四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的趋势中，国家的自主发展不断遭遇风险与挑战。

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矛盾与结构性难题，迫切要求发展方式实现一种内在超越。对于既有发展方式的超越，绝不是对既有现代性成果的全盘否弃，而是立足于发展自身提供的现实条件，积极地扬弃矛盾，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对旧有发展方式的内

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片面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一种全面发展的现代性。片面发展的现代性依赖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自发性、盲目性与非理性，而全面发展的现代性则是科学发展、理性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将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本身。

社会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需要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和引领了我国社会发展方式的新变革。其一，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问题导向，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从发展观高度进行理论反思，由此形成与社会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观。其二，新发展理念具有显著的 科学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应用与发展。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把握住了当代中国发展的特殊规律；既揭示了中国社会自身的纵向发展规律，又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横向交往规律。其三，新发展理念具有严谨的整体性。社会发展是一个有机总体，这就决定了发展理念的整体性。新发展理念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综合的、总体的科学发展理念体系。具体来看，创新发展开启社会发展的新动能，突破社会发展动力“瓶颈”。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矫正社会发展不平衡。绿色发展保障社会发展的永续性，缓解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开放发展营造社会发展的全球境遇，提升社会发展的内外联动。共享发展激发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实现社会发展的 共同富裕目标。

重视对代价学的构建与研究

在实践中，构建一门新的代价学，对于缓解克服当今纷繁复杂且日趋增多的代价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学科意义上的支撑和指导。为了应对解决我国“发展起来”后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克服高昂的发展代价，就必须从学科的角度或高度关注代价问题。

□ 李双套

发展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有发展，就必然有发展的代价或问题存在。如何认识代价、管理代价和克服或调控代价，这是我们从事发展活动所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在对代价的防范和克服中进行的。

近来阅读邱耕田教授撰写的《低代价发展论》一书，了解到低代价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和发展模式，也明白了从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尤其触动我思维的是，该书明确提出了要“构建一门代价学”。代价学是以发展代价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或是关于代价的生成、本质和防范、调控及其与社会发展关系等问题的一门学问。须知，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的代价性。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代价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至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正由于代价的客观存在或必然存在，就使得其自然成为了代价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

代价学主要包括代价发生论、代价管理论、代价克服论等内容板块。代价发生论主要是对于代价的形成以及代价的本质、演变规律等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在代价发生论看来，代价是发展的代价，发展是有代价的发展，代价的发生具有客观必然性。代价管理论则是对于代价管理的必要性和方法论等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代价管理论又包括着代价防范管理论、代价调控管理论、代价恢复管理论等内容。代价克服论是关于如何降低必然性代价、杜绝人为性代价，以实现低代价发展和构建低风险社会的理论体系。在代价克服论看来，当今人类社会是一种高风险社会，当今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高代价发展，这都不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理想状态。换言之，无论是当今中国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实现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转变，争取在对高代价的克服中实现安全的且具有可持续向度的发展。

构建一门代价学，这在我国发展哲学的研究中应当属于相当新颖的一种学术主张，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构建一门新的代价学，对于缓解克服当今纷繁复杂且日趋

增多的代价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学科意义上的支撑和指导。对全球问题或全球性代价的关注，是当今众多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英国学者艾哈迈德在《文明的危机》中指出：“今天，全球危机的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心理等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

而在中国，经过近40年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已经站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平台”上。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面临着发展代价或发展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为了应对解决我国“发展起来”后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克服高昂的发展代价，就必须从学科的角度或高度关注代价问题。换言之，代价学的创建，为我们提供着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使我们因理论上的自觉而达到实践的自觉。只有从学科的角度认识代价、管理代价、克服代价，我们才能既对发展哲学有更深入、更准确了解，又能对发展代价有更全面、更深刻把握，特别是能增强我们在当前的高风险、高代价的时代背景下走低代价发展道路、建设低风险社会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学术评论